

第二十四章

伪满洲国土崩瓦解

关东军全线龟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东军由于害怕苏联从背后袭来，虽未增强兵力，但也未敢削减部队，采取了“大体维持现状，加强防卫，尽量避免发生战争”的方针。当时，关东军除直辖师团外，还拥有5个军、关东防卫军和航空兵团。不算关东防卫军所辖的6个独立守备队、航空兵团所辖的第二飞行集团以及其他特种兵，还有整整13个师团，绝大部分部署在东部和北部边境。1942年7月，关东军强化战备体制，在牡丹江设立第一方面军，在齐齐哈尔设立第三方面军，在四平设立装甲军，在延吉设立第一军，并任命山下奉文和阿南惟几为第一、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关东军司令部也升格为关东军总司令部。但在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一直“避免”与苏发生战争的关东军，始终无所作为而处于总预备队的地位。

但是，关东军丝毫没有放松对苏的间谍以至谋略活动。而在所有的对苏谍报活动中，关东军对苏谍报谋略中心——关东军情报部、即哈尔滨特务机关所进行所谓“哈特谍”具有特殊意义，此项活动一直延续到日本战败投降。这项活动简单来说就是：哈尔滨特务机关通过山路翻译官控制的白匪米哈依洛夫（曾任高尔察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关东军主要部队（不含特种兵）

部队番号	司令部驻地	司令官姓名	所辖部队
直辖第10师团	佳木斯	十川次郎	步10、39、63联队
直辖第28师团	哈尔滨	石黑真藏	步8、30、36联队
直辖第29师团	辽阳	上村利道	步38、50联队
第8军第9师团	牡丹江	樋口季一郎	步7、19、35联队
直辖第12师团	东宁	笠原幸雄	步24、46、48联队
直辖第57师团	孙吴	楠木实隆	步52、117、132联队
第4军第1师团	孙吴	中泽三夫	步1、49、57联队
第5军第11师团	虎林	鹰森孝	步12、43、44联队
直辖第24师团	东安	根本博	步22、32、89联队
第6军第14师团	齐齐哈尔	川并密	步2、15、59联队
直辖第23师团	海拉尔	西原贯治	步64、71、72联队
第20军第8师团	绥阳	本多政材	步5、17、31联队
直辖第25师团	鸡宁	赤柴八重藏	步14、40、70联队
关东防卫军	新京	革场辰己	独守1、2、3、4、5、9
航空兵团		铃木率道	第二飞行集团

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第8军司令官：河边正三。第4军司令官：横山勇。第5军司令官：饭村穰。第6军司令官：喜多诚一。第20军司令官：关龟治。

克反革命政府财政大臣)收买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报务员,窃取苏联电报。关东军对苏间谍谋略活动的一贯方针,是利用白俄。当时,侨居在伪满洲国的白俄有7万人。当然,关东军也提防战争爆发后白俄倒向苏联。关东军操纵控制的白俄武装谋略部队有:第二松花江畔的浅野部队;横道河子白俄森林警察队;海拉尔三河附近的哥萨克警察队。此外,白俄特殊移民区的设立,也全系军事目的。最早的白俄移民区是设在兴安岭绰尔河流域(中东铁路西线博克图南侧,距王爷庙约200公里)的以贝加尔哥萨克为主体的1000名白俄移民区。1939~1943年,又先后在嫩江北甘河、佳木斯北汤旺河上游南叉、东安北十里洼建立白俄特殊移民村。这些移民村都是谋略基地,可牵制入境苏军的侧翼和后方。关东军的武装谋略部队,还有由蒙古人组成的部队,即矶野部队。它始称八六八部队,七八百人,军士以下均为蒙族,军官由蒙、日人混合担任,是专门对外蒙的谋略特务部队。1943年由昌图转至兴安,改称五三部队,由海拉尔特务机关长金川耕作大佐直接指挥。1944年7月,五三部队改为日本正规军,番号称关东军第二游击队,配属于关东军第四十四军,准备从西部对苏联开展游击战。部队中的许多人都是日军间谍学校——中野学校出身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实质是关东军附庸的伪军,也按照作战的需要而不断地被改编。1941年7月,增设第十一军管区,它是伪满最后一个军管区。同年10月,部队改编,取消各军管区教导队,撤销空旅番号,新设工兵、高炮、汽车队,隶属各军管区。当时,各军管区共有:师2(原靖安师和兴安师)、混成旅7、步兵旅4、骑兵旅1、骑独团2、独立连1、独立山炮连1、高炮队5、汽车队5、通信队11、军乐队6。1942年9月,邢士廉

接任伪治安部大臣。1943年3月，伪治安部改为伪军事部，除邢士廉继任伪大臣外，原军政司长日人真井鹤吉任次长。1943年10月，以伪安东、通化两省为辖区的第八军管区（司令官王作震）移驻对苏备战重镇北安，辖伪黑河、北安两省。伪安东、通化两省军务和伪军第十八混成旅（旅长刘汾）转入第一军管区（司令官王之祐）。第一军管区则将伪四平省区及第二工兵队转交给第二军管区（司令官王济众）。1944年春伪军的大事是，铁路警护队编入伪军，改称铁路警护军，司令部设在奉天，濑谷启为司令官，辖6个警护旅和1个训练所。为此在伪军事部内增设警护司。这是伪满中央军事机关的最后编成。但是，根据关东军的要求，1945年4月，伪军部队又被大改编。主要是缩小了各军管区所辖步兵团，骑兵，除蒙族伪兴安军外，一律改为步兵；取消大部分炮兵，收回步兵的所有重武器；取消伪军部队长的通讯权；成立31个工兵队和17个汽车队。显而易见，取消伪军重武器是为了便于控制，而增加工兵和辎重兵，是为了便于为日军修筑工事和从事后勤补给。及至1945年8月8日，苏军开始进军东北时，伪军全被纳入关东军的直接指挥之下。第一、五、九、十、三、四、八军管区及伪江上军受关东军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后宫淳的指挥；第二、六、七、十一军管区受关东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喜多诚一指挥。

关东军加紧控制伪军，使伪军进一步从属化、附庸化，甚至用伪军的装备补充自己，这也是关东军迅速削弱所使然。尽管关东军根据日本大本营的命令极力“避免”与苏联发生战争，但是苏联在保卫斯大林格勒战役取胜后，战局发生战略性的重大转变。1943年11月，苏军收复基辅后，战胜德国法西斯的全面胜利更指日可待。苏联反攻的胜利，自然意味着日本后方的严重危

机。尽管如此，日本大本营为了挽回太平洋战场上的惨重败势，也不得不动用它的总预备队——关东军。从1944年2月到7月，关东军的几乎二分之一的兵力被调往太平洋战场，而且抽调还在继续进行；到1945年初，关东军不但原有的师团全被调走，新建的6个师团中也有2个被调出。同时调出的还有关东军的几乎全部空军和大量作战物资。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即开始处于守势的关东军，由于大批师团纷纷调出，更加惧怕苏联，从1944年便转入持久的守势。为避免刺激苏联，就连专门从事对苏战备谋略活动的关东军情报部、即哈尔滨特务机关都不得不全面收缩其活动。如以“K号工作”为名的从黑龙江上偷袭哈巴罗夫斯克的武装谋略计划的取消^①，和以白俄辅导委员会代替对白俄进行秘密操纵的白俄事务局^②等。甚至连伪满保安局在其“防谍”和“谍报”活动上，也不得不随之采取避免刺激苏联的措施。但日本对苏联是十分戒备的。为了刺探苏方对日态度，1943年秋，关东军由其第二课参谋笹井中佐指示伪满警务总局特务处长高松正二等，对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馆，进行的“光工作”为代号的严密监视。担当者是哈尔滨市警察厅外事科，日本宪兵2名以联络员身份参加，活动情况逐日向关东军报告。监视办法包括：跟踪、照相、窃取文件等等。

日本当时在兵力上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对苏联一直心存侥幸，期望它永守中立，竭力避免对美、对苏两面同时作战。然而，战局的发展不能单以日本的愿望为转移。1945年2月，苏联

① “K号工作”的内容是：伪造苏军K号巡逻艇两艘，艇上人员均着苏联服装，向哈巴罗夫斯克挺进，靠近黑龙江大桥进行爆破。1943年准备就绪，1944年取消计划。

② 为使白俄成为对苏谋略工具和一旦战争爆发不转向苏联，经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批准，1936年哈尔滨特务机关成立了白俄事务局。

关东军所属部队调往南洋及日本状况

调动日期		部 队	调往地点
1944年	2 月	第29师团 第14师团	关 岛 帕 劳
	6 月	第9师团 第28师团 第68旅团	冲绳(后转台湾) 官古岛 台湾(后转莱特)
	7 月	第1师团 第8师团 第10师团 第24师团 第2坦克师团	吕宋岛(后转莱特) 吕宋岛 台湾(后转吕宋岛) 冲 绳 吕宋岛
	10 月	第23师团	吕宋岛
	12 月	第12师团	台 湾
1945年	1 月	第71师团	台 湾
	3 月	第11师团 第25师团 第57师团 第1坦克师团 第111师团 第120师团 第121师团	日 本 日 本 日 本 日 本 南朝鲜 南朝鲜 南朝鲜
摘要	第27师团于1944年1月调往华北		

资料来源：〔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516页。

即将其欧洲的兵力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向远东运输，当同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时，西伯利亚铁路的军运已达高潮。而且，在此之前，4月6日苏联已通告日本废除日苏中立条约。因此，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只是时间问题。日本大本营判断：苏联可在美、英、苏三国的波茨坦首脑会议后的8、9月做好对日作战的准备，届时苏军将有40~50个狙击师对关东军发动进攻。是时，日本大本营的本土决战计划业已确定，而且也已抽调了关东军的骨干兵力，准备拖住盟军进行持久战。1945年5月下旬，冲绳岛的战役结束，美军对日本本土或朝鲜、华中方面的进攻和登陆已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大本营向关东军下达了新的命令，加强对美、对苏作战的准备，并将驻朝鲜的第十七方面军在北朝鲜的部队划归关东军指挥。紧接着，6月4日，日本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飞抵大连，召集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进行会谈，进一步明确按大本营的“击败入侵满洲之敌，大体上确保京图线（新京至图们铁路）以南、连京线（大连至新京铁路）以东的重要地区，谋求持久作战，以利于全面作战”的作战目的，采取步骤，以形成东北、朝鲜一体的作战体制。

这一“作战体制”，实际上就是关东军早已着手炮制的所谓“通化防卫体制”。它是在苏军强大攻势下迅速撤退并谋求负隅顽抗的作战计划。这就是：苏军一旦进攻，关东军将其“国境”地区兵力迅速撤至哈尔滨以南，军司令部迁往通化，将朝鲜军纳入属下，并与华北日军密切联系，将朝鲜、东北、华北日军融为一体，以通化为根据地，以周围的山区为抵抗线，进行持久的防卫战。这一设想和计划，1944年8月，即由关东军参谋副长池田纯久中将透露给伪满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和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为

了秘密建立关东军的通化防卫据点，关东军要求伪满当局向伪通化省配备有力的日本人省次长，并采取措施在通化形成进行战争所需要的起码战力。于是，当时的伪间岛省省长菅原达郎被任命为伪通化省次长，并由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亲赴鞍山，指挥昭和制钢所向通化迁移高炉1座。1945年4月，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和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还曾前往京城（即汉城），要求朝鲜总督府协助通化防卫据点的建设，作为具体化的措施，达成协议，利用为建设朝鲜黄海道水力发电厂所开凿的隧洞，作为武器工厂。从作战计划来说，还包括边境兵团和相应的物资设备后撤，以及在南满、朝鲜之间构筑一系列新的军事工程。预定9月底完成计划，关东军筑城部的建设团全力以赴，7月又从伪满调集3万伪军和大批勤奉队。然而，如此庞大的工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事实上当苏联红军的总攻开始时，很多工程仍在纸上谈兵。

关于兵力问题，由于关东军已被抽调一空，故在5月30日大本营下达命令时，从华北、华中抽调4个师团编入关东军，它们是第六十三师团、第一一七师团、第五十九师团、第三十九师团，其中除第五十九师团部署在朝鲜的咸兴外，其余3个师团均编入第三方面军，而部署在洮南、白城子、通辽、四平、梅河口一线，并于6月中旬至7月下旬先后到位。需要指出，当时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已完全丧失制空权，兵力调动已难以利用铁路，故如来自华中武汉地区的第三十九师团，几乎是靠徒步行军换防加入关东军序列的。这几个师团还算是久经沙场而具有一定战斗力的师团。而关东军其他既有师团，绝大部分都是1944至1945年初在东北当地组建的新师团。其中1944年组建且未调走的4个，1945年2月作为向日本本土抽调师团的补充而组建的8个师团（其中还有1个师团于1945年3月调往南朝鲜）。这些师团的战

斗力是极低的，根本无力对苏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军开始进行所谓“彻底的满洲总动员”，决定把在东北的日侨中可能征集的25万人全都征集上来，丢开“现役主义”，实行老弱齐上战场，紧急编成第三十军、8个师团、7个混成旅团、1个坦克旅团、5个炮兵联队和其他部队。还决定，一旦对苏战争开始，再最后召集10万人。如此紧急拼凑的结果，关东军重又成为拥有24个师团、9个混成旅团以及其他部队的总兵力达75万人的大军了。然而，其实际战斗力，据估计只相当于原有常备师团的8个半师团。往日自诩“无敌”的关东军完全沦为稻草人兵团，很大一批关东军部队，变成了手中没有武器的徒手军。

尽管如此，关东军也还得按大本营的要求完成其对苏的临战部署。这就是：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仍设于牡丹江，指挥司令部设于延吉的第三军和司令部设于掖河的第五师团，以10个骨干师团担任东部的防务；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已由齐齐哈尔迁至奉天，指挥司令部设于新京的第三十军和司令部设于郑家屯的第四十四军^①，也以约10个师团的兵力担任西部的防卫；第四军司令部设于齐齐哈尔，指挥8个师团，担任北部和西部的防卫；第三十四军司令部设于北朝鲜咸兴，指挥两个师团，担任北朝鲜的防卫；第二航空军司令部设于新京，指挥飞机约150架。

苏军的部署，总兵力是关东军的3~4倍。与关东军第三方面军相对的苏联外贝加尔方面军，辖属第十七、三十六、三十九、五十三军，和第六近卫坦克军、第十二航空军、苏蒙骑兵、机械化部队等，共有步兵师27个，快速摩托化步兵师2个，坦克师2个、骑兵师5个、伞兵师1个，炮兵师9个；与关东军第一

① 第四十四军系1945年4月由关东防卫军改编而成，司令部由奉天迁郑家屯。

方面军相对的苏联第一远东方面军，辖属红旗第一、五、二十五、三十五军以及切哥耶夫卡作战集团、第九航空军等，共有步兵师31个，快速骑兵师1个，高射炮师4个；与关东军第四军相对的苏联第二远东方面军，辖属红旗第二、十五、十六和第十航空军，共有步兵师11个，高射炮师3个。此外，还有由战舰78艘、小型舰艇500艘、飞机1500架和1个海军步兵旅构成的苏联太平洋舰队。据苏联公布的资料：它实际参战的兵力为：坦克与自行火炮5500辆、飞机3800架（不含海军飞机）、兵员150万人。^①

1939年关东军在诺门坎战争中惨败于苏联红军的情景，对日本陆军将领来说记忆犹新，尤其是以“武士道”精神而自豪的数万日本陆军，在苏军庞大坦克阵前一败涂地的惨状，不能不使日本“将校”心怀余悸。而如今业已全面削弱了的“稻草人”化的关东军，面对的又是空前庞大的阵营，他们更加不寒而栗。甚至连向伪满总务长官和总务厅次长传达所谓通化防卫体制的关东军参谋副长池田纯久中将都公然声称：“关东军已将大部分武器装备送到日本，全都空了，苏军一旦进攻，只有举手。”当时，大本营和关东军的口号是“全力进行杀敌训练”。但是，日军对付现代化的坦克群的手段只有战刀、枪刺和炸药包。所以，在当时东北的备战战场，不管是受过教育的“在乡军人”，还是从未受过教育的所谓第二国民兵，所有的日本人都被赶出去，作匍匐前进和投掷炸药包的训练。而在奉天的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后宫淳大将的办公室，还放置着二三根长2米带有20公分长矛尖的扎枪。扎枪是按后宫的指示，由昭和制钢所制做的，准备紧急时让女打字

^① 林三郎：《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第167、174~175页。

员和女职员用以杀敌的。①

恶魔准备细菌战

日本帝国主义决策者和关东军的头目们是不甘心失败的。所以，他们的所谓通化防卫体制，不是单纯的军事退缩计划，它还包含烧毁、破坏和游击作战。在破坏方面，甚至还策划炸毁小丰满的大坝，以大量屠杀中国人民。此外，还计划以哈尔滨为第一线，对中国和苏联实施它准备已久的大规模细菌战。为实施此项计划，业已调离的日本细菌战元凶石井四郎中将，于1945年3月重又回到恶魔之窟——关东军第七三一细菌部队，任部队长。

细菌，和化学武器、原子武器一样，是具有极大杀伤力的非法武器。由于制造细菌武器不需要钢铁、稀有金属和汽油等战略资源，所以它就成了“先天不足”的日本帝国主义弥补战力不足的重要手段。1941年夏，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对其部下曾称：“日本没有充分的五金矿藏及其他种制造武器所必须的原料，所以日本务必寻求新式武器，而细菌武器便是其中的一种。”②日本帝国主义始终在做“完成细菌武器，以称霸世界”的梦。

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的前身是以加茂部队为名秘密细菌实验所，1933年春建立于伪滨江省五常县背阴河畔（五常县三岔口），由化名为东乡的石井四郎军医少佐任部队长，故亦称东乡部队。石井，日本千叶县地主家庭出身，京都大学医学部毕业，靠岳父——

① 战犯古海忠之等编写：《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侵略史》，手稿。第1268、1269～1284页。

② 《前日本陆军军人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苏联出版，第117页。

京都大学总长、生物化学专家荒木寅三郎的关系，以军医身份而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准备与实施细菌战的罪魁祸首，他差不多一直主宰着第七三一部队，故第七三一部队，惯称石井部队。^①初建时的石井部队即以逮捕的中国抗日救国的爱国者充作试验材料。1934年夏的一个大雨之夜，细菌部队监禁中的九名中国爱国者，击倒看守，逃跑成功。由于中国人的反抗和秘密泄露，关东军决定迁移部队，于是秘密细菌实验所被付诸一炬。部队新地址在哈尔滨陆军医院南侧，它以医院的一部作伪装，继续其罪恶活动。就在此时，石井一伙研制出生产细菌所不可缺少的滤水器。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阴谋策划，着着进行。如此小规模细菌部队，无法满足日本军部对细菌武器的巨大需求。故于同年，根据日本天皇的秘密敕令，在哈尔滨东南约20公里的平房地区（拉滨线平房车站北约4公里），建造庞大的秘密细菌研究所兼细菌武器制造工场的第七三一部队，部队长依然是石井四郎。1938年6月至1939年8月，部队陆续搬入。石井部队，以黄旗村为中心强占30平方公里耕地，建筑群的面积为2公里见方，其中核心建筑是部队的细菌研究中心——四方楼和“特别监狱”。“特别监狱”秘设在四方楼的内侧，由于四方楼的遮挡，外部难以发现。两座“特别监狱”分设在两个内院里，系兼有地下室的灰色小二楼。两座监狱均长40米，宽约18米，每座每层设有12间牢房，除个别单人监号外，大部分平均监押5人左右，即48间牢房可同时监押二三百人。石井部队所在的平房地区，被关东军指定为特别军事区，适用《军机保护法》，部队设

① 1942年8月，石井因贪污被调离第七三一部队，任驻山西日军第一军军区部长，后曾一度归国，1945年8月重任第七三一部队长。石井调离时北野政次任部队长。

施不许建造两层以上的建筑物，在特别区上空禁止民用飞机飞行；特别区通往外部的所有道路全部置于日本宪兵和伪满警察的严密监管之下；日本军即使是佐级以上的高级军官，如非持有带有关东军司令部印记的特别许可证，亦不得进入区内。

石井部队，是违背1925年关于禁止细菌武器的日内瓦协定的举世无双的大规模杀人魔窟。其主要任务，不仅从事各种病菌的效力、繁殖及应用方法，细菌的大量培养、保存方法，和进行细菌攻击方法的研究，并且实施细菌战。为此目的，部队设有：细菌研究、细菌实战研究、防疫给水研究、细菌生产、总务、教育训练、器材供应、医疗等8个部。石井部队的公开名称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而负责此项业务的只有1个部，即第三部，但就在第三部内也承担特种细菌弹壳——石井式飞机弹的制造任务。1940年，石井部队还在牡丹江、林口、孙吴、海拉尔等地增设4个支部，为第七三一部队培养细菌，并准备对苏实行细菌战。此外，还接管了满铁卫生研究所。本部第二部还辖有专用航空队，和设在安达以东35公里鞠家窝的野外特别实验场。石井秘密细菌部队本部是1941年被命名为满洲第七三一部队的，包括支部在内的全部部队则被称为“满洲第六五九部队”。

石井部队是拥有3000人的庞大的细菌武器研制集团。他们中间的大量“科学家”，虽然同样都是人之子，同享人类生活之福，但是他们完全丧失作为人的良知和人性。他们在恶魔石井四郎等人领导下，不但研制具有巨大杀伤力的无形的细菌武器，而且用活生生的人充作细菌武器的试验。既是对科学的亵渎，也是对人道主义的极大败坏。前面说过，石井部队所设的“特别监狱”经常监禁着二三百人，而每年牺牲于细菌武器研制中的被监禁者，据估计至少有600人，这样，从1940到1945年，大约有

3000人被夺去生命。在石井部队内，这数以百千计的活生生的人，称作原木或猴子。也就是，第七三一部队里的妖魔们把具有人的尊严的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抗日救国的中国爱国者，视为一根木头或一匹动物。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宪兵队把它逮捕的人向石井部队提供称之为“特移送”即特别输送。关于这种特别输送，关东军宪兵队有专门“通牒”，就像就地杀戮的“严重处分”那样，它也是杀戮的一种，称“特移送处分”。根据关东宪兵队的“通牒”规定，凡属下列人员均作“特移送处分”：被逮捕者如系间谍，但因“罪行”轻微估计不会被起诉，可按其性质系“亲苏、抗日”者，或系“无悔改愿望”且大有再“犯”之虞者，抑或是宪兵认为有作“特移送”处理必要者；如系关系民族运动或共产主义运动的所谓“思想犯”，宪兵又认为“其生存对军及国家明显不利者”。按此规定，“特移送”——特殊输送的对象，宪兵、警察是可以任意按主观意志决定的。日本宪兵少尉森三吾曾供称：“除所谓政治犯外，凡有可能判处死刑的一般案犯，均可作‘特殊输送’。华北、华中方面的被俘人员，通过‘大东公司’送交石井部队去的也有。”他还说：“为了造成‘特殊输送’条件，唯一的手段就是残酷的刑讯，即把人抓来后，采用灌凉水、殴打、过电、手指挟铅笔等刑讯，强迫其供认是谍报者。”①

自苏联公布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准备与进行细菌战的资料后，魔窟细菌部队用活人做试验的罪行，才逐渐为人所知，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法庭对有关日本战犯进一步进行审判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准备和实行细菌战，用成百上千的活人进行实验这

① 1954年森三吾口供。《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5卷，“细菌战与毒气战”，第87～88页。

一举世为之震惊的滔天大罪行，更加大白于天下。在第七三一部队当过分队长的山下升供称：“在七三一部队监狱里关押有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这些人被用来进行细菌试验。试验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往嘴里灌细菌，一种是皮下注射。我们队每天用十至二十人进行试验，用灌的方法有四百多人，进行皮下注射的有二百五十多人。”“灌细菌时有宪兵在场。有时被试验的人反抗，宪兵在场镇压；对反抗厉害的人，当场用手枪打死。”“我们都是助手，灌菌和注射的数量由军医规定，我们只是按他们的指示做。用的什么菌当时也不知道，只是后来根据发病的情况判断是什么菌。我们队用的多为鼠疫菌、肠伤寒菌、白喉菌。”“不是所有被试验的人都会死，没有死的送回监狱下次再试验。将试验死的人拉去火炼；有的当时还有气，也拉去火炼。火炼场的大烟囱每天冒着烟。”^①在安达特别试验场，被试验者被绑在相隔25~30米的柱子上，然后由轻型轰炸机从150米高度投下陶器炸弹，在50米的空中爆炸。曾参加此项试验的军医少佐神原秀夫供称：“我穿上了全套预防衣，从五六百米的距离观看了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这个炸弹是填着可怕的炭疽菌的炸弹，让他们从鼻腔吸进绝对没有生存希望的肺炭疽，或因破片让他们发生皮肤炭疽，这是一个特别残暴的行为，我也参加了这种罪恶活动。”^②

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的细菌试验，是为了细菌战的实战，而且已经进行实战。还是在中国全国范围进行的实战。应该指出，细菌部队正式编入日军序列，师团和军分别设有防疫给水班或支

① 1952年5~6月山下升口供。《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5卷，“细菌战与毒气战”，第78~80页。

② 1956年4月28日神原秀夫笔供。《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5卷，“细菌战与毒气战”，第80~81页。

部为名的细菌部队。军以上细菌部队，除臭名昭著的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外，还有隶属于华北方面军的第一八五五部队，隶属于中国派遣军的设在南京的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广州的波字第八六〇四部队也是方面军一级的细菌部队。设在长春南10公里孟家屯的关东军军马防疫部，即第一〇〇部队，也是一支细菌部队，其主要任务是研制兽疫细菌武器。1942年夏，第一〇〇部队曾在三河地区进行实验，对一些河流和沼泽地撒布鼻疽菌，因而污染许多地区。关东军计划，一旦对苏战争开始，日军退至大兴安岭一带进行防卫战时，为使苏军无法利用家畜，将伪兴安北省的约150万头家畜全部赶至大兴安岭以东地区。如果不能转移家畜，则用飞机撒布细菌，毒死全部家畜，为此而命令第一〇〇部队进行准备。上述细菌部队与第七三一部队虽无隶属关系，但第七三一部队却是其他细菌部队的指导者和扶植者。它实际是日本帝国主义准备与实行细菌战的核心和大本营。

第七三一部队的首次细菌战，是1939年夏在诺门坎战争中进行的。当时石井四郎派碓中佐率领碓部队将20余公斤的伤寒、霍乱、副伤寒、赤痢等病菌投入哈拉哈河和附近的沼泽地。其结果，已采取预防措施的关东军尚且发生大批患者，苏蒙军的受害情况可想而知。不过，更多的细菌战是在关内战场上进行的。从1940年9月到1942年，浙江省的宁波、衢州、金华等地，湖南省常德等地全都成为日军细菌战的受害地区，其中1941年11月的湖南常德的鼠疫空投，和1942年7月的金华的鼠疫菌空投，都是石井四郎亲自率队进行的。因此，抗战期间湖南、浙江等鼠疫等传染病猖獗，是和日军的细菌战分不开的，中国大量军民被夺去了生命。无论从空间还是从时间来说，日军细菌战危害和影响之所及，都大大地扩大和延长了。

不过，日军最大规模的细菌战，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其末日之际，决心孤注一掷，准备付诸实施。1945年3月，日本细菌战元凶石井四郎中将重任第七三一部队队长后，立即根据大本营指示，召集各支部长研究、部署以8月末为目标的对苏细菌战。石井向来重视剧烈传染病鼠疫，称鼠疫跳蚤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此，此次细菌战的备战计划是，生产毒化的跳蚤2吨。所谓跳蚤毒化，就是将剧毒鼠疫菌注射给鼠，然后以鼠为饵料饲养跳蚤，以生产唾液腺内含有鼠疫菌的跳蚤。为此，除第七三一部队本部扩大由田中技术中佐指挥的育鼠班和带鼠疫病菌跳蚤饲养班，并动员各支部捕鼠、养鼠外，还通过伪满政府广泛地强制征集田鼠。如今那些强征田鼠的档案文书俱在，其中明确记载“以行政力量确保军需试验用活田鼠三十万只”。^①以致在1945年春天，大量群众，特别是中、小学生都被驱赶到荒郊旷野，捕捉田鼠。第七三一部队当然也在按既定计划，紧张地进行鼠疫细菌和毒化跳蚤的生产。一旦苏军进攻开始，立即以哈尔滨为基地，将北满的广大山河撒满鼠疫病菌，这样不仅百万苏军，中国和平居民，包括男女老人、妇女、儿童，都将倒于鼠疫，即“黑死病”之下。问题是苏联红军的进军行动打乱了关东军的时间表。1945年8月9日凌晨，天空仍在漆黑，苏军飞机投下的照明弹，把偌大的满洲第七三一部队，照射得如同白昼。眼看苏军机械化部队一周内即将到达哈尔滨。措手不及的石井四郎只能做一件事情：消灭恶魔部队的一切罪证。他首先命令第一特别班长石井猛男屠杀在特别监狱中监禁着的大批中国人和苏联人，一名苏联妇女在狱中所生下的婴儿亦未能幸免。然

^①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5卷，“细菌战与毒气战”，第136～149页，载有强制捉鼠的档案和战犯供词。

后，在烧毁和处理一切秘密文件和跳蚤、老鼠和细菌的同时，命令工兵队全部炸毁本部办公楼、监狱、研究室和生产工场。8月11日，收到日本即将无条件投降情报的石井四郎，翌日即发出部队全部撤退的命令。部队专用线推进由数十辆车皮构成的列车，8月13日列车即载着2000多名恶魔及其家属，向南逃窜。而石井及其家属则爬上由其女婿增田军医少佐驾驶的飞机，逃归日本。

然而，中国人民的灾祸并未由此而中止。恶魔们大溃逃时，无数的带菌毒化老鼠，随着房舍的炸毁而逃跑四散。1946年6～9月，哈尔滨附近的若干村落，即发生了使数以百计人丧生的鼠疫。而被散放出来的鼠疫杆菌，经过1946年冬至翌年春夏的繁殖，到1947年秋，酿成由哈尔滨、双城、松花江沿岸，包括辽、吉、黑和内蒙广大地区的鼠疫大流行。而且，此次防治鼠疫的斗争，极端艰难。因为经过检验证实，此次大流行的鼠疫菌，是比一般鼠疫菌毒性大几十倍的变性菌，是增强毒性的变性菌，这种菌正是石井部队经过无数次活人试验而使毒性增强的。最后，经过几十支防疫队的艰苦搏斗，还有数万人死于非命，这也是日本侵略者欠下的一笔血债！

困兽犹斗 大下毒手

满洲第七三一部队的对苏、中大规模细菌战的准备，反映了行将就木的日本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妄图负隅顽抗，垂死挣扎的罪恶心理。在这方面，其表现还不仅于此。

1943年秋，日本的华北方面军以宪兵为基干，编成武装特务游击队——华北特别警备队，1944年又加以扩编，其目的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彻底失败前后，坚持与中国人民为敌，包括对中国进行游击战争。对此，关东军也如法炮制，但其具体化，是在日军

投降前不久。时至1945年春，关东军在拥有现代化装备的苏联红军大规模向远东集结的形势下，失魂落魄，已无心迎战，但又于心不甘。德国法西斯投降后，1945年5月中旬，伪满警务总局在伪都新京召开各省警务厅长会议，会上特别强调强化各重要城市的“防护”设施，特务警察加强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地下组织的破坏，监视民心动向，取缔流言蜚语，特别要加强各重要城市的警察警备队。同时，要求各地严密注视苏军必将进攻的事态。就在警务厅长会议期间，各省警务厅长被召到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向他们强调了苏军进入东北后游击战的重要性，要求各警务厅长立刻充分研究游击战的战术，并向他们分发了关于游击战的小册子。关东军的意图十分明显：以各地警察警备队为核心，将全伪满警察编成对苏游击队。就在此时，关东军以参谋大森三彦大佐为中心，着手研究，以华北特别警备队的经验为基础，以宪兵和特务机关员为主体的，集谍报、谋略和游击战于一体的特殊部队编成问题。最后，关东军特别警备队于1945年8月初编成。8月2日，于关东军司令部召开了特别警备队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关东军特别警备队，简称“特警”，由宪兵、特务机关和兵站警备队编成。当时，除哈尔滨特务机关外，所有特务机关全被编入“特警”。“特警”中还包括一些“专家”。每个大队含保安、游击等7个中队，配备有机枪、步兵炮等轻武器。大队长相当于联队长。一旦对苏开战，“特警”即担任保安、谋略和游击。其第一大队设于奉天；第二大队设在牡丹江；第三大队设于齐齐哈尔。第一特警大队司令官为奉天特务机关长久保久壹少将，关东军参谋大森三彦为高级参谋，司令部设于奉天博物馆内。其他“特警”司令部陆续设立。就在关东军特别警备队出笼的同时，伪满保安局与伪满警察部门合并。这样做的企图之一，便是以关

东军特别警备队为中心，伪警特部门——当然是日本人警特也编成武装游击队，同时也是为了统一进行对东北人民最后的屠杀与镇压。

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此种临终前的凶残，一年前已见行动。1944年7月，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败局已定，塞班岛的日军全军覆没意味着美军即将逼向濑户内海，在伪满洲国，热河地区的八路军已活跃起来，其他地区的抗日地下组织也广泛地开展了活动。值此之际，伪满中央保安局，在伪兴安南省王爷庙，有伪中央保安局参与、关东军武部松雄中佐，参事官秋吉成郎，当地地方保安局参与金川耕作大佐参加，召开了伪兴安总省地方保安局会议，亦称兴安会议。会议目的是，决定所谓决战体制下、即失败前的活动目标。当时，苏联机械化部队向外蒙集结的前景已很明显，从那里可有两条路线直捣我国东北：一条是外蒙→内蒙→林西→赤峰→奉天；另一条是林东→开鲁→通辽→四平。这两条路线均属关东军的薄弱环节，苏军不管利用哪一条路线，不出10天，都可以到达目标。而且，当时活动于热河地区的八路已逼近赤峰，再北上一步即达兴安蒙古。苏联的活动也指向伪兴安总省。此外，诺门坎战争后，蒙古族的恐苏病日增，所谓“赤化”的危险不断发展。因此，伪满保安局决定的活动目标是：

“剔抉”——搜捕来自苏联、外蒙的所谓“外谍”和来自热河的八路军地下工作者，特别是对兴安伪军内的“反日离反动向”须采取特殊对策，必要时进行暗杀。关东军唯恐握有武器的蒙族——主要是伪兴安军起义暴动，所以特别利用伪保安局的特务，对伪兴安军大下毒手。1944年8月，伪兴安总省地方保安局林西办事处事务官水野公治接到巴林右翼旗的冈崎特务股长的报告，说大板上治安队的蒙古人队长，曾对物价上涨和队员生活艰苦表示不

满，还泄露日本将很快败战。于是，他同保安局理事官商量后，将该蒙古族治安队长找来，设宴招待，用酒灌醉，然后在其回归路上，趁其无防，从其背后开枪击毙，并将尸体系上石头投入河中。1945年4月，保安局林西办事处接到伪兴安总省地方保安局长福地家久的命令：“国军（指伪军）干部与八路军有关者（军官）在林西办事处暗杀；下士官兵宪兵团处置。此事已同兴安特务机关长金川耕作大佐研究。”据此命令，由水野公治指挥，林西的团长包中校，伪第五军管区司令部的白军需中尉等接连被暗杀。^①

时至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屠杀镇压，全面开始。苏军开始进军东北的8月8～9日，日伪警特机关已获通知，一旦戒严令发布，即开始屠杀、处理所谓“战时有害分子”，这种所谓“有害分子”总数约有3万人，虽未被捕，但早已列入警宪的黑名单而被监视。至于对监禁中的中国抗日爱国者的屠杀，已经开始。例一：8月9日，伪兴安北省地方保安局局长影山八濑树与理事官河上修商议后，将监禁中的约20人全部杀害；例二：伪黑河省地方保安局将监禁中的14人，其中中国人6名，白俄人6名，朝鲜人2名，于8月12日凌晨1时许枪杀，然后将被害者尸体与拘留所付之一炬。此外，伪三江省保安局秘密监狱——三岛化学研究所，在日本特务们鸟兽散时，也进行了同样的残酷屠杀。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后，附近中国居民进入“研究所”后，发现每间监牢里都躺着数目不等的被击毙的被监禁者的尸体。它说明，日本特务们在逃命时，是从每间牢房的窗子用手枪把被监禁

^① 关于“兴安会议”等情况，参见：战犯古海忠之等编写《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侵略史》，手稿，第1278～1281页。

者打死的。牡丹江事件也是日本帝国主义覆亡时屠杀中国人民的例证之一。1945年7月23日，伪满铁路警护军牡丹江警护团，以“反满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市民和铁路员工23名，拘押于该团拘留所，残酷刑讯。8月10日晚，其中20人被移送伪牡丹江高等检察厅，11日晨又被送到爱河（即铁岭河）监狱关押。8月12日，将该20人和由宁安捕来的抗日组织荣花会30余人以及其他所谓“国事犯”共约100人左右，押送铁岭河日本宪兵队，但因该宪兵队当时已经着火，遂转送牡丹江市宪兵队。押送是徒步的，因带脚镣行走不动者，当即枪杀。及至宪兵队时，他们正忙烧文件，准备撤退。于是又将被押送的人，装入两辆卡车，送刑场屠杀。但在途中，行驶在前面的第一辆翻了车，车上四五十“犯人”，许多受伤。第二辆见此情形返回爱河监狱。在监狱中，日本宪兵在水中投毒令他们饮用，饮者当即死亡。与此同时，日人开始向第一号监狱射击。由于苏军当时已逼近牡丹江市，并已开始攻击，屠杀计划未能全部得逞，他们放火焚烧了监狱办公室，仓惶逃窜。^① 哈尔滨道里监狱当时称刑务支署关押1000多人，其中所谓政治犯有100多人，大部分是未判决的，也有少数判决者。1944年12月19日，发生了抗联三路军破坏事件，特派员于天放和第九支队大队长孙国栋被捕。孙国栋等原押在北安，后转哈尔滨道里监狱，孙旋即被判处死刑，但未执行。苏军进攻后，日伪警特本来计划将狱中政治犯全部杀掉，但因苏军进军神速，碍于情势，未便得手。1945年8月14日午后3时，伪哈尔滨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沟口嘉夫亲自指挥，将孙国栋从第13号监房提出，送至哈

^① 卢福等关于牡丹江事件的调查报告，1954年4月9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8卷，“东北历次大惨案”，第697～698页。

尔滨刑场，施以绞刑。当时的哈尔滨诚可谓兵临城下，上空早已出现苏军飞机。

1945年8月8～9日，苏军开始进攻东北，关东军即按既定计划火速向后撤退。到8月14日，原在牡丹江的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已撤至敦化；原设在齐齐哈尔的第四军司令部已撤至哈尔滨；原设在郑家屯的第四十四军司令部已撤至奉天；至于第三方面军司令部早已迁至奉天。关东军在撤退之前，按既定方针，“把国境线上的城镇，如黑河、孙吴、海拉尔和东安等地的阵地、仓库、兵营和重要设施都给炸毁了。”还“相继炸毁了铁路桥梁，使铁路无法通行。哈尔滨、齐齐哈尔和牡丹江等地的重要设施都被日军破坏了，而且逐渐向南部破坏”。^①参加破坏活动的不只是日军部队。例如在伪兴安总省西科前旗，日本官民撤退时，在西科前旗参事官指挥下，大肆放火，烧毁了国际运输会社的货物仓库、生活必需品会社仓库和兴业银行、玉水饭店等。关东军本来企图将其早已炮制的大破坏计划全部付诸实施，其中包括炸毁松花江上的小丰满大坝，只因关东军估计错误，苏军的进攻比预料提前，关东军一触即溃，各种阴谋、暴行，未能充分得逞。

苏联红军解放东北

日本判断有误：苏军对关东军发动进攻的时间，不是初秋，而是盛夏，误差约1个月。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联名发表波茨坦宣

^① 小島隆男：《“精锐”军的末路——在苏军进攻时逃之夭夭的高级军官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侵华日军战犯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72～73页。

言，勒令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摧毁日本本土。由于苏联未在共同宣言签署，致使日本判断苏军军事部署尚未完全就绪。实际上，早在1943年12月的美、英、苏首脑德黑兰会议上，苏联即已向盟国表态：同意参加对日作战。1945年2月三国签署的雅尔塔协议，更具体地把苏联对日参战的日期规定为德国投降后的二三个月。事实上，从这时——1945年2月起，苏联的欧洲部队已通过西伯利亚铁路源源向东进发。正因为如此，苏联在德国法西斯投降前约1个月——1945年4月6日，通告日本废除苏日中立条约。事实证明，苏军在7月末即完成了对日的作战准备。7月30日，华西列夫斯基被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正式任命为远东军总司令。8月初的重大事态是：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促其投降的第一颗原子弹。于是，8月7日苏联大本营发出训令，要求苏联远东军于8月9日对日开始军事行动；8月8日莫斯科时间午后5时，苏联通知日方：从翌日起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8月9日零点刚过，关东军总司令部即接连收到驻牡丹江的第一方面军的报告：“东宁、绥芬河正面之敌已开始进攻”，“牡丹江遭敌人空袭”。凌晨1点半左右，伪都新京上空也出现了苏军飞机。形势出乎关东军的预料，苏军对日作战全面开始了。可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当时却不在新京的总司令部，已去大连。这天上午，美军又向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8月9、10日，苏军已在全线发起了进攻。当时，在华西列夫斯基指挥下的苏联远东军，按既定部署，梅利茨尼科夫元帅指挥的远东第一方面军向东满和北朝鲜，布鲁卡也夫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向北满正面，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第三方面军向西部边境，全线推进。显然，苏军的进攻，东线和西线是重点。苏军大本营计划：战争打响后，首先从西、东两侧打两个主要战役，即：兴

安岭→奉天战役，和哈尔滨、吉林战役，也就是对关东军进行夹攻，苏军在松辽平原中心地区会师，把关东军拦腰斩断，使之根本动摇、瓦解，失去战力，然后再逐一粉碎。日本大本营为挽救关东军的失败，曾于8月13日命令中国派遣军立即调向南满1个军部和两个师团的基干兵力，并要求中国派遣军与关东军协同作战。而中国派遣军也已准备将驻蒙疆的第一一八师团调往南满，还命令第一六一师团和第六军司令部也跟着出发。问题是，为了割断关东军同华北方面军的联系，把它孤立起来，马利诺夫斯基统率的后贝加尔方面军，即第三方面军首先以其蒙古人民革命军和苏蒙混合骑兵机械化集团，分别直取张家口和赤峰。致使日本大本营所命令的中国派遣军的新调动，和关东军与关内日军的联手，无从实现，这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至于正西面的后贝加尔方面军先头部队，8月11日即已到达大兴安岭西坡，而主力是8月14日向东北中部挺进的。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越境后，遇到的是深山老林和强大的防御工事，这一路首先指向东满重镇牡丹江。北线的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则向齐齐哈尔和佳木斯接近。

苏联红军突然发动进攻，使日本大本营和关东军懵头转向，特别是苏联全线开始进攻的当天，美国还向日本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因而一时更加不知所措。8月10日晨，关东军总司令部才向所属各部队下达全面作战的命令。犹疑不决、迟迟下不了决心的大本营，也是在8月10日这一天才给关东军发出必要时放弃满洲也要确保朝鲜的电报。在一片惊恐中所做出的这一决策，实际上是从原来的通化防卫体制，向朝鲜防卫计划后退了，即完全退出中国东北。而对于关东军来说，一旦开战关东军司令部即由新京迁往通化，乃是早已确定的方针。因此，8月9日——开战当日从大连赶回新京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主要是命令司令部向通

化搬迁，和溥仪不停蹄地亲往伪皇宫动员溥仪随之撤退。又何况，翌日日本大本营又发下舍满洲保朝鲜的命令。所以，关东军司令部8月10日向全军下达的全面作战的命令，实质是全线撤退的部署。按照这一命令，首先关东军司令部自身，和伪满洲国“帝室”与政府，于8月12、13、14日向通化、临江一带撤退，大批日本侨民也撤向鸭绿江畔。其间，驻齐齐哈尔的日军第四军司令部奉命撤至哈尔滨。当时西线显然是全局的重点。苏军计划，西线全面推进后，迅速占领东北的中枢地区。事实上，苏军西线进兵也确实较快较猛。面对这种严峻形势，负担迎战西线的早已龟缩到奉天的关东军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后宫淳大将，对既定的持久战的方针，已完全失去信心，采取了破罐破摔的态度，妄图以其主力与从西线突进的苏军进行决战。为此他已命令移防郑家屯的第四十四军火速回撤至新京至奉天一线。前已述及，第四十四军是刚由独立守备队改编的，它是一支专门对付中国抗日武装的“专业”关东军，拥有6个队即相当于6个旅团的兵力，如今它同刚从关内战场调来部署在梅河口至洮南一线的第三十九、六十三、一一七师团，堪称为后宫淳第三方面军的主力了。负担抵御东线的关东军也迅速龟缩。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在开战的第二天，即由牡丹江迁至敦化。至于第一线的第五军，则从边境撤至牡丹江一带；第三军也退至图们、珲春等地构筑工事。总之，在苏联红军发动总攻击之下，关东军呈全线溃退之势。但是，苏联百万大军，千里战线，在向前推进中，也不无困难。在西线如第六坦克军即因燃料不能及时供应而呈滞进之势；在东线则遇到了庞大的防御工事难以逾越。而且，东西线都有日军部队拼命抵抗，尽管他们大批大批地倒在蜂拥而至的苏军坦克群之下。因此，在日本决定与宣布无条件投降的8月14~15日，苏军尚未占领我国东

北的中枢地区，更未占领伪都新京，当时那里的日伪机关已完成撤离。

美国在日本本土接连投下两颗杀伤力空前的原子弹，和苏联全面参加对日作战，确系促进日本帝国主义加速举手投降的重要因素。1945年8月10日上午，经日本天皇“决断”，日本政府即将接受波茨坦宣言的照会通过中立国瑞士和瑞典政府转交美、中、英、苏四国政府。但是，当时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是附有条件的，即投降不得“有损天皇为最高统治者的权利”。8月12日零时美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实际上是拒绝了日本要求的附带条件。于是，“战”与“和”的争斗在日本统治集团的最高层更加白热化地重演，而导致8月13~14日连续数次召开内阁会议和御前会议的空前局面。最后，还是在8月14日的御前会议上，在一片嚎啕大哭声中，由天皇“决断”无条件投降。当天夜里11时稍过就完成了终战诏书的录音，翌晨交日本广播协会。

以山田乙三司令官为首的关东军总司令部，8月13日尚且收到陆相阿南惟几的“把保卫神州的圣战进行到底”的训令，14日便通过满通社嗅到一些日本马上准备结束战争的气味。留守在新京的情报参谋也很快打来电话：“东京似乎要作出某一重大决定，务请总司令官回新京一趟。”当日傍晚，山田偕幕僚由通化返回新京。同日深夜日本大本营来电：“明天（十五日）将有重要广播，务请注意收听。”^①1945年8月15日中午12时，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在日本国内外同时广播。但是，关东军并未立即正式停止抵抗。因而苏军参谋部于8月16日发表声明表示：苏联远

① 【日】岛田俊彦：《日本关东军覆灭记》，中译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33页。

东军继续攻击日军部队。但因日本大本营下达了“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的命令。于是，关东军于8月17日正式向苏军请求停战。^①苏军认为：关东军各部队难以立即实现全面的停战，故向关东军司令部提出，8月20日12时起，日军全线停止对苏军采取任何战斗行动并缴械投降。8月18日，关东军司令官通过广播答复苏军：准备履行一切投降条件。在此期间，苏军为了尽快占领东北各主要城市并准备受降，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一、第二方面军都特别编成若干快速支队，空投到奉天、长春、旅顺、大连、哈尔滨、吉林等地。8月17日，正当苏联的空降快速支队在奉天机场着陆时，遇到了通化飞来而准备换乘飞机逃往日本的溥仪一行，于是他们成了苏军的第一批俘虏。第二天，苏联远东军副参谋长谢拉霍夫少将亲自指挥的空降兵在哈尔滨降落时，也出乎意料地巧遇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1945年8月19日谢拉霍夫代表苏军与秦彦三郎等会谈投降、受降事宜。此后，关东军经过投降、缴械、就俘，最后有近150名将军，近60万名官兵，被押往苏联。

应该述及，在苏联红军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东北的过程中，东北抗日联军和八路军的作用不能抹杀，他们做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5月，苏联远东军就通知：由抗联将士组成的苏军第八十八旅，准备与苏军一道进军东北，并准备在东北组建10万人的军队。因为当时预计，解放全东北将是相当漫长和相当残酷的战斗过程。同年7月，当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部成立时，由抗联官兵组成的第八十八旅被正式编入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前已述

^① 当日，竹田宫还以天皇特使身份飞抵东北，劝谕关东军迅速处理结束战争事宜。

及，第八十八旅为了迎接进军后的新形势，1945年7月末还召开了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决定将党的组织和党员一分为二：一部分反攻朝鲜，一部分反攻东北。会议组成新的东北党委员会，亦称辽吉黑临时委员会，设在长春，下设12个地区委员会。至于抗联参与和配合苏军的行动，早自8月9日开战前即已开始。1945年7月下旬，第八十八旅的抗联游击队员即陆续被抽调，组成先遣小分队，派到苏联远东各方面军，准备参加空降或充做军事向导。空降小分队一般由4人组成，主要承担火力侦察、开战时里应外合，兼做宣传和群众发动工作。除先遣小分队外，在东北原地坚持斗争的抗联小部队，也奉命开展了与先遣小分队类似的侦察、作战活动。例如：在犁树镇附近执行侦察任务的孙鸣山小部队，不仅及时通告了敌情，使苏军飞机准确炸毁日军弹药车，而且在当地发动群众，组成数百人的队伍，配合苏军向八面通、犁树镇进攻。原来在东北潜伏从事地下工作的抗联人员，在苏联对日宣战后，也纷纷奋起斗争。如：1943年回东北潜伏的王亚东、冯淑艳，很快组织起一支队伍，在当地群众配合下于穆稜泉河击溃了一支约300人的撤退日军。抗联主力——第八十八旅原本是待命与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一道挺进佳木斯地区的，后因战局发展迅速，日本很快投降，任务有变。1945年9月初，抗联主力分批返回东北，配合苏军收复东北各要地。

1945年8月9日，苏联开始对日作战当天，毛泽东主席发表了题为《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0日起，朱德总司令陆续下达多道命令，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总反攻开始。闻风而动的不只是东北抗联，冀热辽军区也立即投入解放东北的战斗。他们按命令，立即从其所辖的19个团中，抽调最精锐的8个主力团和朝鲜义勇军等万余人，加之4名地委书记以及行署主任

等率2500名干部，分三路挺进东北，8月中、下旬在围场、承德、平泉、绥中等地先后与苏军会师。其中，东路是进军主力，由李运昌亲自率领，在绥中同苏军会师后，在苏军支援下回师攻克山海关，并继续沿奉山铁路前进，经锦州，9月8日进入沈阳。

溥仪退位被俘

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军事殖民统治的工具与招牌的伪满傀儡政权，随着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和关东军的覆灭而土崩瓦解。1945年8月9日之前，由于广大群众不知真情，社会上一般还保持表面上的大致平静。苏军飞机一批批地飞临东北各地上空后，气氛为之一变。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虽然没有立即欢呼雀跃，但是对于突然发生的剧变却泰然自若，无不期盼着光明的赶快到来。因为，伪满末期日伪江河日下的悲惨形势，已使人们深切感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败亡已为期不远。陷入一片恐慌和混乱的，只是曾经长期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日本侵略者，和依附于日本侵略者的汉奸走狗，他们像丧家之犬，感到末日来临。

1945年8月8日午夜过后，伪国务院总务厅通过防空通讯获悉，一架国籍不明的飞机通过哈尔滨上空南下。这一情况立刻被值班员通知给以总务长官为首的日本首脑者们。作梦也没有想到是苏联已发起进攻，因为关东军没有发下任何有关苏联的情报，他们还以为是米机B29向北飞行，因为美机临空倒已经是多次了。然而，未几飞机向新京监狱投下两枚炸弹的消息传来，凌晨3时更正式发来“苏军已从东部国境方面开始进攻”的通报。这才使惊慌不安的日本高官们确认了事态。9日拂晓，东方刚刚发白，总务长官把日本人首脑们召集到长官室，讨论应急对策。总

务长官武部六藏还按早已准备好的“非常时对策”，以伪国务总理大臣名义通知各伪省长：“今后，关于中央认可事项勿须申请，可根据当地情况独断专行。必要时中央另做指示。”

8月9日上午7时，关东军司令官把总务长官找去。当时，山田乙三刚从旅大赶回。在苏联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关东军司令官仍一如既往，每月一次赴旅，花天酒地，品尝无上欢乐，以致苏军发动全线进攻之日，竟然临阵无首，这不能不引起正苦虑于形势的广大日本人的不满与不安。但是，赶忙归任的山田司令官既未收到大本营的对苏应战的命令，也没有向关东军下达全线作战的指示。他在通知总务长官苏联已开始进攻之后，即偕参谋长秦彦三郎和“御用挂”吉冈安置前往伪皇宫会见溥仪。会谈时，又响起空袭警报，他们随即一同钻进防空洞，警报解除后，才又回到同德殿。山田要求溥仪立即随同关东军向通化大栗子沟转移。而毫无思想准备的溥仪，以家眷、佣人和行李太多为由，表示难以马上行动。最后双方协议缓期三天。自此，溥仪等人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一面紧张地收拾家私和行装，一面盘算厄运将如何来临。溥仪更怕的是：日本侵略者杀人灭口，以保守其14年来实行殖民统治的阴谋与秘密。

8月10日上午8时，关东军司令官再次把总务长官找来，告诉他伪满政府的最高官吏和重要特殊会社的最高层干部，明日即11日晚10时乘车向通化转移。接着，武部总务长官于9时许，在总务长官室召开伪满政府各部次长等日本人首脑官吏和伪中央银行总裁等的会议，传达关东军司令官的指示，要求明日即11日晚8时在总务厅集合，一同出发，每人所带行李严格限制为一件。然后，武部又通过伪国务院会议和伪参议府会议，向各汉奸大臣和参议传达了关东军司令官向通化转移的命令。

10日上午，伪宫内府大臣熙洽还曾传溥仪之谕，召集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伪参议府议长臧式毅、伪尚书府大臣吉兴和伪侍从武官长张文铸等5人，传达溥仪等向通化大栗子转移的决定。5人虽都表示异议，并面见了溥仪和山田乙三，但局面已不能改变。于是，由张景惠、臧式毅出面召开了以“防卫会议”为名的散摊会。会议决定：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吉兴、张文铸、邢士廉、阮振铎、于静远、卢元善、阎传綏等跟随溥仪前往通化大栗子，于镜涛、金名世、黄富俊、谷次亨等留长春“处理政务”。关于日本人高层官吏的去留，他们自己也经过会议研究，决定各部队长等均暂时留下不走。

为了准备向通化的大溃逃，伪满中央银行准备输送金额达5亿元的现存纸币。关东军则夺取了当时长春保存4吨鸦片，和伪满政府所拥有的白金和钻石。同时，关东军还以其特权，用一、二等卧铺车编组的避难列车，载着可能带走的行李、全部家属，驶向朝鲜。接着是满铁的避难列车。当伪满官吏家属开始输送时，日本人市民已对关东军、满铁优先撤退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于是，大规模的日本市民撤离开始，他们乘坐无盖的货车，一列列地开走。当时，麇集在站前广场的日本侨民，拥挤不堪，水泄不通，而且，从8月13日晨又天降大雨，准备逃离的日本市民，男女老幼被淋得如同落汤鸡一般，但仍悄然地循序等待上车。

就在伪都新京日本军官民全线大溃逃之际，8月11日深夜，天空一片漆黑，“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置带领的4部汽车开进伪皇宫，停在缉熙楼前。乘坐在第一辆汽车中的，除“御用挂”外，还有伪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和日本宪兵曹长浪花。14年来，桥本可是个非同一般的人物，他除了曾任日本近卫师团长和陆军次官外，还先后担任关东军参谋长、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和伪

满参议府副议长。此刻他的出现是履行他的伪祭祀府总裁的职责，是来捧象征天照大神的三种“神器”来了。溥仪的车队在黑暗中驶向车站时，空袭警报的笛声又响了，实际这是为溥仪戒严而采取的特别措施。但是，溥仪一行没有大摇大摆地从新京车站上车，而是由吉冈安直带领从长春东站钻进在那里停靠的“展望车”。车虽然还是那辆“展望车”，但是车内的陈设却今非昔比了，一大堆桌椅杂乱地放在里面。至于其它各节车厢，更是一派逃难惨象，不堪入目。火车用了整整一天，才时进时停地勉强爬到通化车站，那里倒是戒备森严。原来是，早已逃到通化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亲临车站迎接溥仪。而溥仪抵达通化站只是换车，8月13日清晨又到了大栗子车站。身在大栗子的溥仪原来仍由伪皇宫警卫队保卫，但是事隔一日，即换成日军，借口是留在新京的警卫队已经“哗变”。不管事实真假，日本帝国主义确实是唯恐溥仪在最后时刻拥有亲信武装。

这里值得提及的是，留在伪都新京的关东军和伪满官僚的狼狽相，往日作为殖民统治者的威风一扫而光。关东军曾规定，撤向通化者每人只许带1件行李。可是，关东军司令官逃离时却带着大小行李17件，参谋长秦彦三郎带着20件，由日本士兵押送，在人人斥骂声中撤往通化。而在新京关东军司令部，只是寥若晨星似地留下第四课原善四郎参谋和矢部主计少佐，其他人全部逃之夭夭。但在新京郊外，饭田祥二属下的部队，却开始挖掘深深的坦克壕。8月14日，关东军的汽车满载着夺自伪满的鸦片准备驶向通化，车上还插着日本国旗，但是刚一出发，司机即被击毙，押车的伪总务厅参事官绪形浩弃车而逃。这说明，伪都新京的中国广大群众已公开地群起反击日本侵略者，他们已成为过街老鼠。向通化方向赶送新京酪农会社数十头牛的生活必需品会社

的一伙日本人，临出发时也遭到郊区农民的反击，弃牛而逃。

伪满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临行时改变主意，留在伪都新京，与次长古海忠之以及各部日本人次长等，共同应付局面。当时，是战是和尚未确定。伪满政府人员仍在源源东撤，但因缺少火车，各机关竞相征抓马车。8月13日，关东军留守者要求伪满首脑官吏全部都赶快撤离。但是，当8月14日晚，伪满首脑官吏齐集总务厅准备撤离时，却从满通社传来重大消息，即日本将无条件投降，明天15日正午将发表败战“敕语”。集合人员顿时一片混乱：高声嚎啕者有之，奢论卷土重来者有之。狂妄与绝望的喊叫充斥在总务长官室。但是，最后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个个垂头丧气地溜走。留下的武部与古海也相对无言，沉默而坐。8月15日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广播后，总务厅命令各部门立即烧毁机密档案。

就在此时，日本侵略者也没有放弃对傀儡溥仪的摆布。武部总务长官决定令伪满皇帝颁布伪满洲国的解散“诏书”。8月16日，他带着炮制好的“诏书”文本飞向通化，17日再由通化乘汽车前往大栗子。日本侵略者导演的最后一幕，由溥仪宣读《退位诏书》，前后只10几分钟，短命的傀儡王朝，即宣告解体。然而，至此日本帝国主义者仍在控制溥仪，死死不放。吉冈带领溥仪向日本逃亡，连皇后等人都没有同往。不料，在奉天机场遇上苏军空降快速支队，而成为苏军俘虏。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帝，几经折腾，竟成了一名阶下囚！